

◎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八)

大學中庸譯註 新編

學思光著



●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八)

大學中庸譯註 新編

勞思光 著 黃慧英 編

大學。孔氏之遺書。不
 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
 序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明德。此
 仁
 之遺書
 者。獨賴此
 子其不差而
 觀。觀。觀。觀。
 欲明明德於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者
 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致知在格物。



中文大學出版社

《大學中庸譯註新編》

勞思光 著 黃慧英 編

© 香港中文大學 2000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法，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903-X

2000 年第一版

2001 年第二次印刷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封面攝影：張燦輝

An Annotation to Daxue and Zhongyong (in Chinese)

By Lao Sze-kwang, edited by Wong Wai-yi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903-X

First edition 2000

Second printing 200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總序

勞思光先生過去四十年來，執教於港台兩地，作育人才不計其數。期間，先生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淵源尤深。先生自一九六四年受聘於中大，至八五年底榮休為止這二十幾年間，首先任教於崇基學院當時的宗哲系。根據一些學長的憶述，早期的宗哲系本以宗教為主，而哲學組別當年的所有課務，幾乎全都要由先生獨力肩負。除此之外，先生當年對崇基的通識課程的改革，出謀獻策以外，還於具體的課程設計和教材編寫工作上，付出了不菲之心力。隨着大學制度上的蛻變，和新亞、崇基兩院哲學課程的合併，先生除進一步參與重組課程工作外，更曾出任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之職。八六年以後，先生於中大曾先後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和逸夫書院高級導師。先生之於中大，可謂鞠躬盡瘁。

先生治學，素稱嚴謹，其於學術上樹立的典範，亦早昭著於海內。然而，最令我們佩服的，是先生從來不把自己的學問與思想限囿於學院之中。先生心中的哲學是康德所謂的「世界哲學」。先生自己長於理論，但其真正的關懷卻絕不止於純粹理論的層面，而直指向傳統的觀念制度、現實的社會文化，乃至國族的歷史命運。先生反思之餘，運筆成書，與其說是為要譽於學術同儕，不若說是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坦蕩蕩的一份報國情懷。先生問學，一向講求「尊理」，亦不輟地以此責求於天下間的學

子。是以先生的著述之中，除了許多理論性的重點著作之外，亦不乏把哲學向社會上普羅青年讀者推廣的作品。

先生半生著述，先後出版過的論著，難以勝數。其中部份論著雖已絕版多時，但坊間訪求者，仍日有之。台灣的時報出版公司於八十年代中曾把先生早年(至五七年止)的文稿輯成《思光少作集》七卷刊行，多年以來，已於各界廣為傳誦。是次出版的《思光學術論著新編》，計劃中共有十三卷。按年代而言，《新編》基本上收錄了先生五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留港期間的主要代表作品。《新編》所收各卷，除一二例外，基本上以先生從前刊行的專著為藍本。然而，這次重刊，除重新校訂舊有書稿外，如遇有題材相關，而以往尚未收錄於書的文稿，亦將審情收錄，以免遺珠。至於先生於中大任內完成的《中國哲學史》三卷，固可說是先生的代表性力作，但由於已供台灣三民書局再版重印，因此這次未列於《新編》出版計劃之中。

《新編》的出版，首先要感謝的，是勞先生本人的首肯。其次，我們要感謝友聯出版社林悅恆先生慷慨回贈勞先生原於該社出版的書籍的版權。就物質條件而言，中文大學出版社上下的支持，當然是計劃得以順利完成的主要關鍵。此外，中大副校長金耀基教授對出版計劃提供的寶貴意見，亦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在此一併致謝。

中國人文學會編輯委員會
關子尹、張燦輝、劉國英
識於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九八年仲夏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編校凡例

(一)《新編》以重刊勞先生五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留港期間刊行成書的學術著作為主。於重編時，除校訂原本外，若遇有題材相關、卻未曾收列於書之文章，均審情採用，收作附錄。

(二)勞先生同期發表的其他論文中，不乏已有輯錄成書之條件而終未成事者，是次新編，將按題材匯編成冊。

(三)重編各書時，基本上按舊作重校；除訂正誤植及漏植之文字外，內文原則上不作改動。

(四)標點符號依現今通行的法則作適當之修訂。

(五)編者為求文義更清晰而偶爾加插的文句，均置於方括號〔〕中，以資識別。

(六)源自外文之哲學術語譯名，悉依勞譯；原文只有外文之術語，在可能情況下提供今日通行的翻譯。

(七)外國人名翻譯，如與今日通行中文譯名有別者，均依今譯修訂；原文中只有中文譯名者，則附上外文原名。

(八)原文中如出現古體字或異體字，於不影響原文文義之情況下，均改用今日通行的字體。

(九)為方便編排與閱讀內文出現之外語文字，《新編》各書一律橫排。

(十)一切註釋，皆統一為書頁下之腳註。

(十一)重編各書之章目，以及附錄文章之名稱，悉依初版；若有需要，則適當地加上小標題。

(十二) 新編各書，如外語學術名詞及外國人名出現頻繁，均於書末附上中外人名及學術辭彙對照表。

《大學中庸譯註新編》小序

《大學》及《中庸》的語體譯本，原是應當時友聯出版社之邀，為他們的文選所撰寫的。文選本供中學生閱讀，因此，這種工作基本上並不要求符合很高的學術標準。不過，這兩個出自《禮記》的文件，本身原含有許多待決的問題，而且由於朱熹將它們與《論語》及《孟子》合編為四書，成為明清官學所尊崇的經典，它們的重要性也是無可爭辯的。我最初接受邀約，從事這兩個文件的語譯工作時，雖然多少有一點遊戲或遣興的心情，但真正下筆之後，便察覺到這個工作並不是那樣輕鬆；無論就訓釋文旨或闡述理論的層面看，語譯的工作者都要面對一些難題；而要處理這些難題，便不能不涉及某種學院性的研討。這就會使得這個譯本與青年讀物的要求全不相稱了。我當時頗感為難，後來便決定另加幾條「譯註」，將所涉的理論問題及考訓問題收進去，譯文本身仍力求簡易。結果則使我在這個譯本中並無機會闡述我自己對《大學》及《中庸》的論點。另一面卻又不能完全避免提及我對前人成說的不同意見。

現在新編本即將付印，編校的負責人另加案語若干條，點明我對二書的看法與朱熹章句中觀點之差異；同時又要我在序言中，對二書之本旨及朱熹之詮釋作一簡要評述。我覺得這或許確會有助於澄清某些有關認識傳統中國哲學的問題，因之，便略說我的幾點意見。

第一，就《大學》及《中庸》本文而言，原旨並非難解。但二書

中各有某些辭意不明的詞語，造成後世解釋者的困難，舉例講，《中庸》中「上焉者雖善無徵……」一段，所謂「上」、「下」究竟何所指，本文辭意不明，後世詮解亦無定論；不論是「以時言」、「以位言」或「以德言」，都有難通之處。於是這一段便成為「疑義」所在了。又如《大學》論旨本意甚為明顯，但作為工夫始點的「格物」與「致知」，卻並無確定解說；究竟「知」是指「知止」呢？抑或指「知所先後」呢？若取前者，則是指理分說；若取後者，便是指具體的實踐次序說。兩個論點大不相同。本文內部並無可作判準的語句可提供解答的線索，於是朱熹便拋開原文，自作一段「補傳」了。然而「補傳」是「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所以朱熹的工作結果，只是借《大學章句》以發揮伊川一系的工夫論。嚴格說，這並無助於後人了解《大學》一書。日後王陽明立說，本身造境雖高，但對「格物」與「致知」的解釋，顯然離原文愈來愈遠。這就使得「格」、「致」、「物」、「知」等詞語意義皆無定解，而成為《大學》的「疑義」所在了。對這些「疑義」，我們今日只能根據客觀成立訓釋標準，尋求一個論據最強的解釋，無法獲得真正的結論。不過，這些「疑義」若不妨礙我們了解二書的基本論旨，則我們亦不必在這種死結上盤旋。

第二，若就二書的基本論旨說，《大學》論旨在於闡明「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而以「知所先後」（次序）為工夫。工夫的中心在於個人之成德，故說「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前有格致誠正的努力過程，修身後向外展開德性的影響，則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效用。就全幅理論看，這個文件的論旨是將政治生活收攝在道德生活之中；對於道德生活內層的種種問題並未詳究，對於政治生活的特性問題則完全取消。可說是徹底代表儒家德治思想的文件。

《中庸》論旨則較為複雜，原文是否由不同文件輯合而成，也有爭議。但其中所含的哲學成分，則屬於本性論模型，又加上「天道」與「人道」的對分觀念。於是「盡性」與「誠」便成為《中庸》論旨的核心。但《中庸》各章合看，並無統一的脈絡，轉不如《大學》脈絡較為分明。此中又有許多涉及考證的問題，在此不能多說。

就哲學史的標準說，《中庸》自有其重要性。稍知中國古史的人都知道古文化有南北之分，而哲學中的形上學思想原起自南方。故老子言「道」是最早的形上觀念。孔孟學說中實在並無形上學理論。《中庸》成書於秦統一之際，已吸收南方道家思想，因此最早提出一儒家的形上學。此後，在宋代儒學重振時，《中庸》便成為談形上學的儒者們共同尊崇的經學。若專強調形上學，這種情況也不難了解。但若從「成德之學」的立場看，則形上學架構未必特別重要，而《中庸》的地位也就未必能夠保持了。

第三，說到朱熹撰寫這兩個「章句」的理論立場，則可以分兩層看。在基本層面上，朱熹大致以伊川一系的工夫論及本性論觀點，詮釋二書。這一點在談「格物致知」的理論時尤其明顯。但在許多枝節性的解說中，則朱熹又採取配合經文的傳統解經態度。這一點在解說《中庸》中一些有神祕色彩的觀念時，最為明顯（即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一段，便是實例）。

至於我自己的哲學立場，則多年來論述已詳，在這裏便不多說了。

最後，我對黃生慧英於執教之餘費許多心力來作編校工作，至為感謝；相信她所加的案語亦有助於讀者對我的譯文的了解。

一九九九，序於台島

目 錄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總序	v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編校凡例	vii
《大學中庸譯註新編》小序	ix

《大學譯註》

原文及譯註	1
附 錄	33
一、關於《大學》	33
作 者	33
題 解	33
考 證	34
二、提 要	37
主 題	37
體 裁	38
分 析	38

《中庸譯註》

原文及譯註	41
附 錄	105
一、關於《中庸》	105
作 者	105

題解	105
考證	105
內容思想	109
二、《中庸章句》卷頭引程顥語	110
三、朱熹《中庸集解·序》(節)	111
四、朱熹《中庸章句·序》	111
編者跋	115

大學

原文及譯註

大學¹之道，在明明德²，在親(新)民³，在止於至善⁴。

知止而后有定⁵，定而后能靜⁶，靜而后能安⁷，安而后能慮⁸，慮而后能得⁹。

物有本末¹⁰，事有終始¹¹；知所先後¹²，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¹³者，先治¹⁴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¹⁵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¹⁶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¹⁷；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¹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¹⁹。致知在格物²⁰。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識，意識而后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²¹。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²²。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²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²⁴，未之有也²⁵。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²⁶。

【語譯】

大人之學的路向，在於使自己的德性自覺明朗，在於使他人能夠革新進步，在於以成就自己及成就他人的圓滿價值為歸宿。

對歸宿能有明澈了解，然後方能堅守不移；能夠堅守不移，然後方能不為外物所動；能夠不為外物所動，然後方能隨處自得；能夠隨處自得，然後方能精思詳辨；能夠精思詳辨，然後方能進退如理。

一切對象有「根源的」與「枝節的」之差別；一切工夫有「終結的」與「開始的」之差別。能明白其間先後的次序；就可以接近正當路向了。

古代的人想要使天下人都能德性明朗，便先得使他的國家有秩序；要想使他的國家有秩序，先得使他的家族公平有序；要想使他的家族公平有序，先得培養自己的德性；要想培養自己的德性，先得使自己的心靈不受情緒的干擾；要想使自己的心靈不受

情緒的干擾；先得使自己的意念無作偽之處；要使自己的意念無作偽之處，先得擴拓自己的價值自覺^一；而擴拓自己的價值自覺的工夫，便落在一個個行為的求正當上面^二。

^一 這裏是採用王陽明之說；因為朱子之說落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一關鍵上，便顯得難通。朱子所說的「知」是對外物的知識；這種知識與意念之誠偽實在不能有確定關係。朱子解「致知格物」時，所提出的理論是承程門之說；認為由一一事物上求知、進而達到一種貫通之知；又以「至」釋「致」，即將「致知」說成「盡」（或完全顯現）之意。在補傳中，所謂「故其知有不盡也」與「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都是根據以「盡」釋「致」的觀點；因此，朱子便有「窮理」的觀念，來配「致知」，而以「即物窮理」釋「格物」。依照這個說法，要完全顯現心靈之知的大用，便須即物窮理；這裏雖然牽涉到知識性質的大問題，但仍可通。不過，這樣解釋了「致知」，便很難解釋何以「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倘說「要意念無偽，先得窮盡顯現知的能力」，則必須將誠偽變成知識問題；這顯然不能成立。朱子對誠意與致知的關係，始終未提出精切說明；而《大學》本文中對「誠意」只是單獨解釋，所以此一理論關鍵在朱注中也輕輕掠過。取陽明之說則「致知」是「擴拓價值自覺」，以這種工夫為誠意的條件，理路便十分明朗了。因為意念的誠偽顯然受價值意識直接決定。一個人在善惡好壞方面有明朗自覺，然後方能在意念的誠偽上用工夫。

^二 這裏也是用陽明之說。關於「致知在格物」，朱子固有承自程子的解法（見上），但不如陽明解法圓通精到。「格物」釋為「正行為」，即在「正行為」這種努力上求「致知」，這裏顯出道德實踐的精義。我們能在行為上有一分求正的努力，同時價值自覺便明朗了一分、擴拓了一分。這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體驗到的。反過來說，我們在行為上有一分怠忽，則價值自覺便有一分萎縮，一分黯淡；這也是人人可以反省到的。

行為得正，然後價值自覺便得到擴拓之效；價值自覺擴拓

了，然後意念方能純誠而無偽飾；意念純誠而無偽飾了，然後心靈方不受情緒干擾；心靈不受情緒干擾了，然後使自身有德性脩養；自身有德性脩養了，然後方能使家族中公平有序；家族中公平有序了，然後方能使國政有秩序；能使國政有秩序了，然後方能使天下安定。

從掌最高政權的人到一般平民，一律都是以求自身的德性修養為基本工夫。基本處不能上軌道，而枝節處上軌道，是不會的。對於較親近的地方淡薄，而卻對較疏遠的地方親厚，是沒有的事。^一

^一 「厚薄」二字指事物關係時，可以「親近」解「厚」，「疏遠」解「薄」；指態度時則「厚」是「厚待」之意，「薄」是「淡薄」之意。因「淡薄」不能用來表事物關係，故第二個「薄」字譯為「疏遠」；至於「厚」字則譯為「親厚」及「親近」，分別指態度及關係。

這就是說「知本」，這就是說「知」的極致。^一

^一 這兩句被朱子認作錯簡，移到後文作為釋格物致知的傳文之殘餘。因為這兩句在本文中與「格物致知」並無一定的關聯；而就字面說，這裏的「至」字解作「極致」較明；所以我們雖在解「致知」時用王陽明之說，但這裏解「至」字仍取接近朱子的說法。我們不一定將它看成對「致知」的解釋，即不致有困難了。

【註釋】

1. 大學：本與「小學」相較而言。朱子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但所謂「古之大學」詞義欠明，容易使人誤會，以為周秦以上真有像「太學」一類的機構。朱子又說：「大學者，大人之學也。」這個解釋比較恰當。所謂「大人」，自然是與「小人」互別的詞語。而「小人」又有兩個解釋，一是指「平民」；另一是指品德卑下的人。由此「大人」一詞也可能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貴族」，另一是指品德高尚的人。「大人之學」，兼含這兩個意義在內；意思即是指具有品德的貴族應有之學。拋開訓詁講，則古代洒掃應對及書數之事，都稱為「小學」；成就品德，教化羣